



● 民主与科学的呼唤

新青年

陈独秀等 著 王中江 苑淑娅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民主与科学的呼唤

新青年

陈独秀等 著 王中江 苑淑娅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醒狮丛书

谢俊美主编

新 青 年

陈独秀等著 王中江 苑淑娅选编

责任编辑 张燕萍 责任校对 王 清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354 千字

1999 年元月第 1 版

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00 册

ISBN7-5348-1720-X/C·15

定价:20.00 元

《醒狮丛书》总序

《醒狮丛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1997年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郭孟良先生和张燕萍女士风尘仆仆从郑州来到上海，邀我主编一套有关介绍近代思想家名著方面的丛书，想以此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近代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想法非常好。其实，江泽民主席近几年来一直要求我们加强近代史的学习，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编辑计划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鉴于此，我虽不才，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要说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什么要不惜花大力出版这类盈利不多的著作呢？我想自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一番道理。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历史研究乃至出版计划，往往都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再到历史中寻求答案。随着社

2150/02

会历史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不少人对于历史知之不多。由于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变局”,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上的探讨,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多次出现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八九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先是鼓吹新儒学,大倡文化复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苏联解体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方法论,乃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也不顾这些理论原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一股脑儿地介绍到中国。其中有些理论、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合中国国情,很快退出了文化舞台而销声匿迹。不过,透过这些言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是国人在国门打开后,有鉴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深感自己落后,急于寻求迅速改变现状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争论的表层好象是现代化问题,实际内里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的近代文化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拍击中国的堤岸,进行殖民侵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声光化电之类的科学技术,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民主、人权乃至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并日渐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抵触乃至冲撞,由此而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由于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承认和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学习西方这一著名的历史课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围绕着学习西方,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先后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折衷调和、全盘西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都是在近代中国国情制约下,特定思维模式的产物,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因“世变之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议院,而容闳则干脆将他所了解和学到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

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夭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在流亡异国的日子里,康有为撰述了《大同书》,企盼大同世界的出现,然而他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也未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孙中山在屡经挫败后,重新构思新的建国方略。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则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中除旧布新的若干内容,时至今日还灼然有华。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每一场争论,时而给人以惊吓,时而又给人以力量。这种争论构成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早已有了结论。历史告诉人们,东西方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理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接受和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不可规避的事实,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探索,直到五

四运动前夜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最后实现了民族独立,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斗争活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我想这大概就是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图吧。

最后,从编辑本丛书而联想到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忧危国家的前途命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个人的历史可以有轻浅,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业犹如大海巨川,波澜壮阔,汹涌向前。人文知识分子不应为目前的困难惆怅和忧伤,不应弃守自己的阵地,应当像历史上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呻吟和独立富强的热望交织中,毅然决然投身社会,追踪时代,大胆探求真理。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种守恒力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重塑自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重建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让我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共同努力吧。

谢俊美

1998年1月于沪上

目录

醒狮丛书总序·····	谢俊美(1)
永不尘封的《新青年》·····	王中江 苑淑娅(1)
敬告青年 ·····	陈独秀(26)
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	陈独秀(34)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节选) ···	高一涵(38)
新旧问题 ·····	江叔潜(51)
今日之教育方针 ·····	陈独秀(56)
人生唯一之目的 ·····	李亦民(63)
抵抗力 ·····	陈独秀(71)
民约与邦本 ·····	高一涵(76)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	陈独秀(83)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	高一涵(87)
我 ·····	易白沙(95)
自治与自由·····	高一涵(102)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106)
孔子平议(上、下) ·····	易白沙(111)
新青年·····	陈独秀(123)
青春·····	李大钊(127)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139)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146)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蔡子民(156)
再论孔教问题·····	陈独秀(160)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164)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	吴 虞(168)
我之孔道观·····	常乃德(172)
社会·····	陶履恭(178)
体育之研究·····	二十八画生(183)
以美育代宗教说·····	蔡元培(195)
文学革新申义·····	傅斯年(201)
人生真义·····	陈独秀(212)
“今”·····	李大钊(216)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	傅斯年(220)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钱玄同 独秀(229)
新的！旧的！·····	李大钊(236)
易卜生主义·····	胡 适(240)
我之节烈观·····	唐 俟(257)
科学与鬼话·····	俟(266)
国粹·····	唐 俟(270)
自大主义·····	迅(272)
非君师主义·····	高一涵(276)
人的文学·····	周作人(282)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	陈大齐 钱玄同(290)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295)
论自杀(节选)·····	陶履恭(298)
不朽·····	胡 适(304)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陈独秀(313)
何为科学家·····	任鸿隽(326)
古迷·····	彭啸殊(33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李大钊(337)
吃人与礼教·····	吴 虞(359)
本志宣言·····	陈独秀(364)
新思潮的意义·····	胡 适(367)
科学的起源和效果·····	王星拱(376)
调和论与旧道德·····	陈独秀(38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 原因·····	李大钊(390)
基督教与中国人·····	陈独秀(398)
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节选) ·····	顾孟余(408)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424)
什么是科学方法·····	王星拱(430)
法律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杜 威(435)
生存竞争与互助·····	周建人(442)
罗素的逻辑观和宇宙观之概说 ···	王星拱(450)

永不尘封的《新青年》

王中江 范淑娅

世经交会,“蓦然回首”,寻访“灯火阑珊处”,“何者最关情?”是一切枭雄?是大树特树的石碣碑刻?不!唯有那“貌不惊人”、永不尘封的《新青年》,让“大历史”独有所钟。《新青年》,世纪性的名刊,划时代的最强音,中国新文化象征。历史不意味着过去,未来诞生于昔梦。带着渴望和期待,让我们重新阅读《新青年》吧!

一

民国初年,共和之梦被老贼袁世凯粉碎。1912年的临时约法,名曰言论、舆论自由,实则横加种种限制。新闻报刊比先前骤减,至到1915年,思想界冷冷清清。就在此时,反袁流亡日本的一位热心青年,回到了上海。他就是“一枝独秀”、经受了新思想洗礼的陈独秀。他不甘中国沉沦,他要从根本上救中国,他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代青年身上,他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拍即合,旋即在更具开放性的沿海大都市上海办起了一份月刊——《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中国现代一份不寻常的刊物《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诞生,助产婆是上海求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当其

初,陈独秀是唯一的编辑,其艰辛不言而喻。1916年2月15日,待第六号出版后,因故停刊半年。幸运的是,半年之后,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出版,更改为一个更响亮、更醒目的名字——《新青年》。1917年2月,《新青年》出至第二卷第六号。由于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所以从第三卷开始,《新青年》亦移至北京编辑,但仍在上海出版。北京大学聚集着一批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自由知识精英,陈独秀左右逢源,《新青年》声势大埒。1818年1月,《新青年》成立了编委会,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等人名列其中,高一涵、胡适等人后亦加入。每人轮流主编。从第六卷第一号开始,附上了法文刊名“La Jeunesse”。看一看《新青年》的目录,很容易发现,它的主要撰稿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耀眼明星。除了以上提到的名字之外,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王星拱、张申府、傅斯年等人的名字,也都不时地出现在《新青年》上。1919年,“五四事件”爆发,陈独秀发表言论,痛斥日帝和北洋军阀。6月,他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警察暗探逮捕。杂志亦被迫停刊。9月,陈独秀被营救出狱。同年11月,《新青年》重又复刊。191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新青年社”,编委和主要撰稿者都加入了该社。但是,1920年夏季后,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分歧,已经难以缝合,“新青年社”开始分化。热心于政治实践活动的陈独秀又回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随之又移到了上海编辑。但秘密警察使它难以在那里生存。不得已,杂志又南迁广州。1922年7月1日,出到第九卷第六号,之后休刊。1923年,虽又复刊,但复刊后的《新青年》,改弦易辙,已不再是新文化运动意义上的《新青年》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骄子的《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休刊,前后历时8年,共出版九卷54号。单从它的时限和数量指标来说,它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真正能够体现《新青年》独特精

神气质的,是它为 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所带来的划时代的冲击波和震撼性,是它诉求科学与民主、解放思想,启蒙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强大魅力和感召力。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说不完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五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阵地《新青年》。身临其境的蔡元培和胡适都深有感触,他们评论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蔡语)“《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胡语)诚哉斯言!

那么,《新青年》的划时代性何在呢?它不仅划分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界限,而且划分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界限。一般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观念的演变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即“器物阶段”、“政教阶段”和“文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种社会运动相对应。尽管所说的观念演变的这三个阶段,在细节上并非完全如此,但它作为对句清民初观念变迁的描述图式,大体上与实际情形相符;尽管不能说这三种观念在实践功能上,一个比一个更根本,但这三个阶段大体上表明了中国对西方和自身事物认识的逐渐深化。“文化阶段”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性,它表现为一系列新观念的探险和精神冲动。而这都是通过《新青年》表现出来的。下面,我们从一些主要方面上,来考察和反省一下《新青年》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观念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

《新青年》最引人注目的关切之一,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观念的检讨和反省。说起来,中西文化的比较,

并不始于“五四”《新青年》，在晚清思想界，它已经有了相当的表现。但是，除了象严复这样的个别人士之外，从总体上说，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晚清依次集中在“器物之异”和“政教之异”的观念上，面对中西文化方位的比较则非常薄弱，特别是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国民性、人的精神气质等方面，还没有被作为核心或关键突出出来，而这正是《新青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上的突破。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晚清思想界虽然已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并且出现了象谭嗣同那种强烈反传统的声调，但整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尚未受到动摇。但是，《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的挑战和反叛，既集中又猛烈，即使不能称为“全盘反传统”，也可以说是“整体反传统”，而作为替代物，则是对西方文化的高度倾心，即使不能说“全盘西化”，也能够说是“充分西化”。正是这一正一反的取向，犹如十二级台风和八级地震，狂吹和震撼着当时的思想界，既赢得了大量的共鸣，也引起了一些反对之声，并且至今仍是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新青年》的焦点。

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可谓是代表性的一篇。他以整齐对称的语言，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归纳为三点：即“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类似这种排比式、带有阵阵节奏感的中西文化比较，在新文化知识分子中比比皆是。如李大钊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确定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并由此引伸出一系列两个不同的“一”：“一为自然的，一为人造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

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一为人间支配自然。”如此等等,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能会一直“一”下去。这些看上去似乎都蛮有道理的东西文化比较图式,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景观,至今还被效法。但是,仔细考察起来,究竟有多少靠得住,不能不使人大生疑问。冯友兰在20年代初,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切实研究,既一时不能有效,所以具体的事实,都没有清理出来,而发表意见的人,都是从他们个人的主观的直觉,去下些判断。”(《论比较中西》,载《学艺》第三卷第十号)但这些判断,却往往“查无实据”。

很明显,《新青年》以及当时其它大量的中西文化比较,都不只是认知上的兴趣,不只是为了指明中西文化的异同。中西文化的比较,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价值意识。也就是说,所谓中西文化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中西文化的优劣和好坏。既然有价值上的优劣、好坏之分,采取了整体上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的取向和选择态度,也就顺理成章。如果说《新青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代表了“西化派”的价值取向,那么与之相对立的梁漱溟、辜鸿铭等保守主义者,则代表了“东方文化派”的立场和态度。两方虽然都是比较中西文化,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评判中西文化优劣、好坏,也不是说没有标准。按照《新青年》的标准,主要是“科学”和“民主”。此外就是“今”和“新”了。“今”相对于“古”,“新”相对于“旧”,现在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词汇,并不深奥。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古今”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座标和理想尺度。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古”是现实正当、合法性的基础,是理想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改革主义者来说,“今”则是一切事情的出发点,社会必须因时制宜,不法常法。这种思维方

式和价值模式,近代以来仍然被使用着,作为评判事物是否合理的尺度。“新”与“旧”在传统中并没有多少根源,它们是近代以来被突出的一对对立性观念。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新”意味着进步、适宜、正当和价值,而“旧”则意味着落后、过时、非正当和无用。与之不同,保守主义者则往往作了相反的理解。在《新青年》那里,“新”和“今”,具体所指就是西方文化及其观念,因为它是“新”的、“今”的,所以它就是合理的、优越的和好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是“古”的、“旧”的,所以它就是不合理的、劣等的和坏的。这种评价态度,显然过于片面。因为中西文化都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简单地用“新”或“旧”作为评价的标准,结果只能是一个形象完美独好,一个则一无是处。特别是,西方文化也不都是“新”的,中国文化也不都是“旧”的。但是,以“进化论”和“进步论”为“公理”的《新青年》自由知识分子,看来只能是“喜新厌旧”、“厚今薄古”了。

二

从引介西方哲学和借助于西方哲学观念观察中国传统哲学来说,《新青年》并不是最早的。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严复、王国维、梁启超都已经作了许多工作。通过他们,黑格尔、康德、叔本华、穆尔、斯宾塞等西方大哲的一些哲学思想和理论,都先后或差不多同时传入到中国;另外,运用西方哲学观念观察和理解中国哲学的方式,也已经展开了。然而,在这两方面,《新青年》仍以自己所做工作的新颖性和独特性而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形象。

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引介上,《新青年》除了继续对斯宾塞、穆尔、叔本华的思想有所介绍外,同时开始了对柏格森、尼采、赫克尔